

“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研究



张汀*, 曾韦嘉, 李嘉伟

重庆理工大学重庆知识产权学院, 重庆 400054

摘要: 中国正处于人口政策快速调整的关键时期, 这一变化会对女性劳动参与率产生深刻影响, 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关乎妇女的经济独立性、家庭社会地位及整体社会生产率。在这一背景下, 本文使用 2014 年和 2016 年的 CFPS 追踪数据, 利用双重差分法计量方法定量分析了“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影响及其影响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发现, “全面二孩”政策推行显著降低了女性劳动参与率, 下降幅度达到 7.29%。当更换关键因变量时, 该结果依然稳健。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 该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 即该政策的实施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和已经有一个子女的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更加深刻与显著。因此, 政府、社会、企业层面应当采取更为灵活的就业扶持措施, 在保障生育政策的顺利进行, 促进生育水平提高的同时, 还应加强教育培训力度, 提升育龄夫妇收入能力; 增加公共养老服务供给, 保障生活权益; 为解决政策的推行会显著降低了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问题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关键词: “全面二孩”政策; 女性劳动参与率; 双重差分方法

DOI: [10.57237/j.ssr.2023.04.001](https://doi.org/10.57237/j.ssr.2023.04.001)

Study on the Impact of the "Comprehensive Two-Child" Policy on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Zhang Ting*, Zeng Weijia, Li Jiawei

Chongqing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ongqing 400054,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at a critical juncture in its rapid population policy adjustment, which will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women's labor-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which is related to women's economic independence,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ir families, and overall productivity.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we used CFPS tracking data from 2014 and 2016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comprehensive two-child" policy on female labor-market participation and its heterogeneity, using a dual difference measurement.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two-child" policy significantly reduced female labour participation by 7.29%. The results were still robust when the key variables were changed. Further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impact is significantly heterogeneous, i.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has a deeper and more pronounced impact on rural female labour force and female labour participation with one child. Therefore, more flexible employment support measures should be adopted at the

*通信作者: 张汀, 872388711@qq.com

government, social and enterprise levels. While ensuring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child-bearing policies and promoting higher levels of child-bear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hould also be strengthened to improve the earning capacity of couples of child-bearing age. Increase the supply of public pension services and safeguard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living; Provide effectiv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significantly reduces female labour participation.

Keywords: "Comprehensive Two-Child" Policy;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1 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中国人口结构性问题日渐突出,劳动人口不断下降,调整生育政策逐渐成为中国应对该类问题的重要选择。作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参与者和承担生育责任的主力军,青年女性是实现生育政策调整目标的关键主体。自国家“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调整以来,据全国妇联 2016 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一半以上的一孩家庭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生育政策的变革和实施会极大地影响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不少研究指出,女性身上的母、职双重负担,是现阶段难以实现生育政策调整目标、维护劳动力市场有效供给的症结所在。另外,农村地区的女性相比城市地区更容易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是由于城乡存在较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城市中的女性更多的是从事正规部门的工作,工作时间一般固定。而农村地区的女性更多的是从事非正规部门的工作,工作时间具有弹性。[1]

因此,深入关注女性生育和就业的关系,对促进生育政策调整目标的实现,以及进一步推进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环境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中国学界尚未从多维角度论证生育政策的调整对女性群体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影响,本文从城乡差异、已有子女数量、个人满意度等维度,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广泛全面的研究,引入因果推断的研究方法,使研究结果更加稳健。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劳动参与率产生负面影响

2.1.1 育儿成本效应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对孩子的生育、教育等传统观念发生了巨大改变,每个家庭对此需要投入

的人力、物资等日益增加,女性怀孕、生产、婴儿喂养、孩子教育、医疗、居住等各项费用加起来是一笔巨大的成本开支,增加了大多数普通家庭的经济负担。同时,由于女性在育儿过程中往往承担了大部分的养育成本,所以可能导致女性在收入方面处于劣势。除此之外,女性也是家庭无酬照料劳动的主要提供者,家庭完成生育后,相比男性,大部分女性会花费更多时间与精力承担家庭照料责任[2],从而直接导致女性就业参与机会减少、职业发展潜力受限,在职场面临系统性困境。因此,从育儿成本效应来看,“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2.1.2 劳动力供给效应

“全面二孩”政策通过影响女性劳动力供给、用人单位需求的意愿和行为进而对总体供给量产生影响。生育政策调整放松了对育龄女性生育数量的限制,有利于改善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增加未来的劳动力供给,但短期内多孩生育导致出生数量的增加意味着有更多的年轻女性因生育而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会使得实际劳动参与人数加速减少。

从女性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女性因怀孕、生产、哺育子女的时间延长,会直接导致劳动供给的多次“中断效应”,即女性的劳动供给被迫中断,选择主动或被动地退出劳动力市场。张海峰(2022)[3]提出从就业竞争力来看,在当前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女性生育之后长时间脱离劳动力市场会导致职业技能下降,脱离时间越长,回归后的职业地位和薪水可能越低,这一现象不仅会降低女性自身想要重回工作岗位的意愿,还会降低雇主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现实表现为雇主更加愿意招收男性,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会带来“沮丧工人效应”。从女性家庭角度来看,刘爱玉(2019)[4]提出在家庭领域“男

人养家”“男主外、女主内”“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等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在中国的城镇和乡村地区均出现回潮趋势。陶艳兰（2015）[5]提出女性作为子女的核心照料者被期待投入大量的情感和时间，这可能导致女性改变原来在家庭和工作之间的时间分配，从而冲击她们的工作表现，甚至面临照料家庭和工作两难选择时，一些女性宁可放弃就业，将精力和时间留给家庭。因此，从劳动力供给角度而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降低了女性劳动参与率。

2.1.3 劳动力需求效应

在人口数量一定的前提下投入到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数量却不是固定的。劳动参与率越高，投入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数量相对就越多经济增长越快；反之如果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它对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利的影响[6]。陈琳（2010）[7]提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企业必然面对两次为女性员工支付相关人工成本的处境，女性员工生育期间转岗培训成本和提前退休的福利成本进一步增加。此外，企业认为女性员工怀孕期间工作效率低下，生育之后重返工作岗位时会因较长时间的工作中断而对知识、业务变得生疏，人力资本退化在所难免，与此同时，企业也要为女性员工的恢复调整期支付相应成本。所以，企业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会权衡男、女性员工的人工成本，这就导致了企业为降低人工成本、规避风险，招聘时将一些符合二孩生育资格的适龄女性排除在外或降低对其的重用程度，导致女性的就业难度增加。多数企业在面临女性生育二孩雇佣成本增加时，更倾向于招聘且重用男性，女性的合法权益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从劳动力需求效应方面，“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加重了女性的就业难度，降低了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

2.2 研究假设

2.2.1 “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作用

“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给所有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提供了生育二孩的机会，但家庭所面临的经济负担与女性所面临的生育与职业发展的冲突也会空前增加。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庭在生育观念上逐渐发生转变，家庭倾向于生养数量更少但是质量更高的孩子，这就意味着家庭在一个孩子上会投入更多的精力财力。基于这种观念，女性生育孩子后，会花费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提升孩子“质量”。同时女性生育孩子将会面临返工时间

长、薪水降低、职业技能下降等问题，导致女性不愿重回工作岗位。企业也会因女性员工生产休假、转岗培训、提前退休等付出更多的成本，导致就业歧视等问题。所以，“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会从育儿成本、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方面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从而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

H1：“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劳动参与率产生负面影响。

家务劳动是维持正常家庭生活秩序的重要部分，也关系到家庭内每个成员的生活，而在家务劳动中分工问题一直是家庭社会学中的重要议题。一直以来，家庭内的劳动被人们默认女性应承担更多。而在“全面二孩”政策和退休政策的双重影响下，女性在角色的承担上更是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多女性在担任妈妈、奶奶或姥姥的角色时不得不退出劳动市场。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8]：在工作日，女性的总劳动时间为 574 分钟，男性为 537 分钟；在休息日，女性的休闲时间为 240 分钟，男性为 297 分钟；被访者目前 3 岁以下孩子基本由家庭承担照顾责任，其中，母亲承担日间主要照顾责任的比例为 63.2%；城镇 25-34 岁有 6 岁以下孩子的母亲在业率为 72.0%，比同年龄组没有年幼子女的女性低 10.9 个百分点。

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9]：在工作日，在业女性平均总劳动时间为 649 分钟，其中有酬劳动时间为 495 分钟；女性照料家庭成员和做饭、清洁、日常采购等家务劳动时间为 154 分钟，约为男性的 2 倍；0-17 岁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辅导作业和接送主要由母亲承担的分别占 76.1%、67.5%和 63.6%；女性平均每天用于照料、辅导、接送孩子和照料老人、病人等家人的时间为 136 分钟，已婚女性平均每天家务劳动时间为 120 分钟。

以上数据表明，女性在家庭中需要承担大部分的家务劳动以照料家庭，从一个女性的生命周期角度来看，可以看到她们为家务劳动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长对她们的就业选择、就业机会均会造成负面影响，同时降低她们的收入。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

H2：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长对女性劳动参与率产生负面影响。

2.2.2 城乡差异的影响作用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之间的种种差异，城乡家庭

的生育观念与生育行为存在较大差异。传统观点认为,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因素、传统观念的影响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中国城乡间的生育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城乡居民的性别偏好差异也比较明显。郝娟(2011)[10]通过对2000年以来中国城乡生育水平的分析,指出中国农村总和生育率为低水平的1.8,而城市总和生育率为极低水平的1.3,总的来说城乡生育差异仍然存在,但近年来城乡生育率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这主要得益于一孩生育率城乡差异的缩小,而城乡生育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二孩生育率方面。城市生育意愿普遍低于农村,因为农村受教育程度相对更低,受传统观念影响更甚。李卫东和尚子娟(2012)[11]运用结构化理论,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研究中国农村地区的男性偏好文化,认为农民所遭遇的“生育困境”与所处的“关系情境”对男孩偏好具有重要影响,中国生育政策的限制也导致了大多数人偏离传统的生育惯例而陷入一种“生育困境”之中,这使得个体关于生育的反思在时间和空间上上升为一种集体性的反思,进而将微观的男性偏好卷入宏观的生育文化系统中。侯佳伟等(2018)[12]基于对数据的分析,得出中国的男性偏好一直处于弱化阶段,中国社会正从有性别偏好社会向无性别偏好社会悄然转变,当前性别偏好对于性别比的影响在于男性偏好的弱化迟缓于女性偏好的弱化程度,呈现出相对强化的男性偏好。总而言之,因为中国农村生育率高于城镇,又因农村更易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所以“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农村女性生育意愿强于城镇。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3:

H3: 城乡差异的异质性特征对乡村女性劳动参与率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

2.2.3 已有子女数目的影响作用

生育和就业是女性的权利,也是女性具备的能力,生育让女性变成母亲,就业让女性参与社会分工,每个角色都有需要承担的责任,不同的角色会带来不同的责任。因此社会角色理论认为,当一个女性同时就业和成为母亲,两种角色之间会发生冲突。这种角色冲突的社会现实和社会认知,也是女性在就业时遭遇歧视的因素之一。已有研究针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对女性就业带来了负面影响。张川川(2011)[13]提出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南国铨和李天国(2014)[14]提出家中有婴幼儿或学龄

前子女会降低已婚妇女的就业率。康蕊和吕学静(2016)[15]提出生育第二个孩子,不仅将造成女性职业中断,还迫使女性在就业过程面临被歧视的风险。杨慧等(2016)[16]提出一个家庭养育第二个孩子对家庭工作平衡的影响要远超只有一个孩子的情形,生育第二个孩子对女性带来的家庭工作冲突远大于男性,女性是男性的2倍左右。所以,子女数量增加会显著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其中拥有一个孩子的家庭,若生育第二个孩子,女性将会面临将会在就业过程中面临被歧视的风险。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4:

H4: 已有子女数目的异质性特征对只有一个子女的女性劳动参与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

3 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实证数据选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6年的微观数据,以女性为研究对象,收集了个人、家庭、社会三个层次数据信息,2014年和2016年样本量均为1197个,共计2394个。2014年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女性样本数量为512,占当年总样本数量的42.77%,2016年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女性样本数量为474,占39.6%,总体呈下降趋势;2014年农村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样本数量为232,占19.38%,2014年城镇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样本数量为280,占23.39%,2016年农村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样本数量为208,占17.38%,2016年城镇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样本数量为266,占22.22%,农村和城镇均呈下降趋势;样本女性年龄集中在15-49岁;样本中已婚女性占比较大,2014年已婚女性样本数量为774,占64.66%,2016年已婚女性样本数量为820,占68.5%;2014年和2016年子女数目均大多为1个或2个,且2016年末生育子女的样本量减少;受教育程度与健康程度均逐年提高。

3.2 模型设计

本文借鉴袁航和朱承亮(2018)[17]的做法,使用双重差分法估计“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设定模型如下:

$$Y_{c,t} = \alpha + \beta_1 DID_{c,t} + \beta_i Control_{c,t} + \eta_c + \gamma_t + \varepsilon_{c,t}$$

式中, $Y_{c,t}$ 是因变量, $DID_{c,t}$ 是核心解释变量,

$DID_{c,t} = treatment_c * Time_t$ ，在样本期内，若是已婚育龄期内女性（根据谢宇（2020）的界定，育龄妇女年龄大于 16 周岁，小于 50 周岁的女性对象），则 $treatment_c = 1$ ，其它情况则该值为 0。其次，若年份大于 2015 年，则 $Time_t = 1$ ，其余年份则该值为 0。下标 c 和 t 分别为地区和年， $Control_{c,t}$ 表示影响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且随 c 和 t 变动的控制变量， η_c 表示地区固定效应， γ_t 表示时期效应， $\varepsilon_{c,t}$ 为误差项， β_1 为“全面二孩”政策影响的方向及程度。

3.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为了验证“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本文以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长作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交互项 DID_{ct} （ $DID_{ct} = treatment_c \times time_t$ ），控制变量则分个人、家庭、社会三个层面。

3.3.1 变量定义

关键被解释变量。女性劳动参与率定义为女性在年满劳动年龄，实际参与劳动的比例，它是衡量女性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指标，反映了女性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工作时长定义为每周总共用于工作的时长。

关键控制变量。城乡分类定义为基于国家统计局资料的城乡分类。婚姻定义为女性接受访问时的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定义为受访者已完成的最高学历。个人生活满意度定义为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子女数目定义为家庭已有子女数目。家务时长定义为女性每周总共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长。

3.3.2 变量选取的指标解释

被解释变量。女性劳动参与率，不参与劳动赋值为 0，参与劳动赋值为 1。工作时长，每周总共用于工作的时长（小时）。

个人层面控制变量。城乡分类，基于国家统计局资料的城乡分类，乡村女性赋值 0，城镇女性赋值 1。年龄，女性接受访问时实际年龄（岁）。健康状况，非常不健康赋值 1，不健康赋值 2，比较不健康赋值 3，一般赋值 4，比较健康赋值 5，健康赋值 6，非常健康赋值 7。受教育程度，文盲或半文盲认为是未接受教育且赋值 1，已完成最高学历为小学赋值 2，已完成最高为初中赋值 3，高中或中专或技校或职高认为是已完成最高学历为高中且赋值 4，已完成最高学历为大专赋值 5，已完成最高学历为本科及以上学历赋值 6。个人生活满意度，非常不满意赋值 1，比较不满意赋值 2，一般赋值 3，比较满意赋值 4，非常满意赋值 5。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子女数目，接受访问时已有子女个人，不包括怀孕。家庭规模，接受访问时家庭成员个数。家务时长，每周总共用于干家务的时长（小时）。

社会层面控制变量。就业，被访者认为就业问题在中国的严重程度，严重程度用 0 到 10 表示，不严重赋值为 0，非常严重赋值为 10。教育，被访者认为就业问题在中国的严重程度，严重程度用 0 到 10 表示，不严重赋值为 0，非常严重赋值为 10。医疗，被访者认为就业问题在中国的严重程度，严重程度用 0 到 10 表示，不严重赋值为 0，非常严重赋值为 10。住房，被访者认为就业问题在中国的严重程度，严重程度用 0 到 10 表示，不严重赋值为 0，非常严重赋值为 10。

表 1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代码	赋值	2014 均值	2016 均值	2014 标准差	2016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女性劳动参与率	y_1	不参与=0；参与=1	0.43	0.40	0.49	0.49
工作时长	y_2	每周总共用于工作的时长（小时）	15.46	4.57	25.71	16.04
控制变量						
个人						
城乡分类	x_1	乡村=0；城镇=1	0.54	0.55	0.50	0.50
年龄	x_2	接受访问时实际年龄（岁）	28.28	30.28	9.86	9.86
婚姻	x_3	未婚=1；已婚=2	1.65	1.72	0.48	0.49
健康状况	x_4	非常不健康=1；不健康=2；比较不健康=3；一般=4；比较健康=5；健康=6；非常健康=7	5.90	5.91	1.05	1.11
受教育程度	x_5	未接受教育=1；小学=2；初中=3；高中=4；大专	2.86	3.15	1.01	1.19

变量名称		代码	赋值	2014 均值	2016 均值	2014 标准差	2016 标准差
			=5; 本科及以上=6				
	个人生活满意度	x_6	被访问者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 (1 非常不满意, 5 非常满意)	3.87	3.67	0.96	1.02
家庭	子女数目	x_7	接受访问时子女个数, 不包括怀孕	0.88	0.90	0.91	0.92
	家庭规模	x_8	接受访问时家庭成员个数	4.71	4.78	1.80	1.89
	家务时长	x_9	每周总共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长(小时)	2.03	2.34	1.68	1.86
社会	就业	x_{10}	被访者认为就业问题在中国的严重程度 (0 不严重, 10 非常严重)	7.16	6.84	2.07	2.17
	教育	x_{11}	被访者认为教育问题在中国的严重程度 (0 不严重, 10 非常严重)	6.90	6.50	2.42	2.27
	医疗	x_{12}	被访者认为医疗问题在中国的严重程度 (0 不严重, 10 非常严重)	6.65	6.48	2.34	2.25
	住房	x_{13}	被访者认为住房问题在中国的严重程度 (0 不严重, 10 非常严重)	6.74	6.33	2.49	2.32

表 1 列示出了相关变量及其统计信息, 可知, 2014 年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均值为 0.43, 2016 年下降至 0.40; 2014 年的工作时长均值为 15.46, 2016 年下降至 4.57。

从个人层面来看, 2014 年城乡分类均值为 0.54, 2016 年增至 0.55; 2014 年婚姻均值为 1.65, 2016 年增至 1.72; 2014 年健康状况均值为 5.9, 2016 年增至 5.91; 2014 年受教育程度均值为 2.86, 2016 年增至 3.15; 2014 年个人生活满意度均值为 3.87, 2016 年降至 3.67。由此可知, “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后, 已婚女性人数增多, 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 女性个人生活满意度的下降。

从家庭层面来看, 2014 年子女数目均值为 0.88, 2016 年增至 0.9; 2014 年家庭规模均值为 4.71, 2016 年增至 4.78; 2014 年家务时长均值为 2.03, 2016 年增至 2.34。由此可知, “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后, 女性家庭子女数目增加, 做家务时长增加。

从社会层面来看, 2014 年被访者认为就业在中国的严重程度均值为 7.16, 2016 年降至 6.87; 2014 年被访者认为教育在中国的严重程度均值为 6.9, 2016 年降至 6.50; 2014 年被访者认为医疗在中国的严重程度均值为 6.65, 2016 年降至 6.48; 被访者认为住房在中国的严重程度均值为 6.74, 2016 年降至 6.33。由此可知, “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后, 女性认为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的严重程度均下降。

图 1 列出了 2014 年、2016 年城乡女性劳动参与率所占比重的变化。2014 年, “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在整个群体的占比为 19.38%, “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占比为 23.39%。2016 年, “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比重为 17.38%, “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比重为 22.22%。因此, 从城乡差异来看, “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后, 城乡

女性劳动参与率均显著下降, 其中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比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更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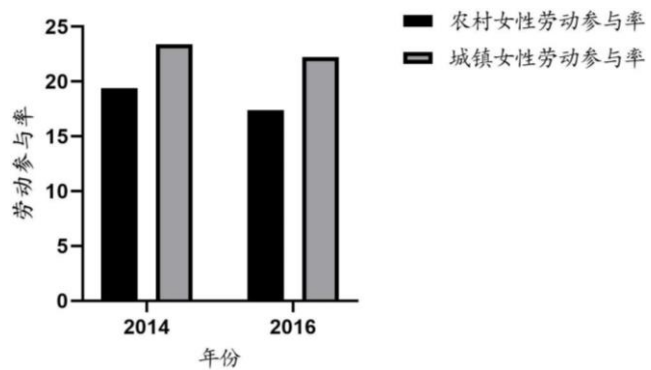


图 1 “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与“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所占比重的变化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运用 Stata16 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 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表中第(1)、(2)、(3)列分别控制个人, 家庭和社会的特征变量, 其回归系数为负值, 分别为 -0.0685、-0.0383、-0.0461; 第(4)列同时控制个人, 家庭和社会的特征变量, 其回归系数为负值, 数值为-0.0729; 通过对比前四列的回归系数可知, 在 1%显著性水平下 “全面二胎”政策对女性劳动参与率成负向影响, 即“二胎政策”降低了女性劳动参与率, 验证了假设 H1。

在第(1)列和第(4)列的城乡指标回归系数均为负值, 显著性分别为 5%和 1%的水平下, 数值分别为-0.411 和-0.159; 其中第(1)列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更大, 说明城乡分类变量在只控制个人特征变量时反映的负面效应

更加深刻。在第(2)列和第(4)列中的家庭规模回归系数均为负值，数值分别为-0.018 和-0.00669；其中第(2)列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更大，说明家庭规模变量在只控制家庭特征变量时反映的负面效应更加深刻。在第(3)列和第(4)列的中国教育问题严重程度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显著性均为 5%的水平下，数值分别为-0.0133 和-0.0131，其中在只控制社区特征变量时反映的负面效应更加深刻。表中第(5)列是以“女性每周工作时长”为工作时长为被解释变量，其回归系数的结果为负值，显著性为 1%的水平下其数值为-14.60，表示在 1%

显著性水平下“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劳动参与率成负向影响。与以“女性劳动参与时长”为解释变量的结论一致，进一步证明“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劳动参与率成负面影响。

出现此结果主要与劳动力供给效应和劳动需求效应有关。生育政策的调整提高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女性主动退出劳动市场的比例增加；同时，企业在选择劳动力时基于对员工生产力的考量也减少了对女性员工的聘用，因此“二孩政策”降低了女性劳动参与率。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女性劳动参与率				女性每周工作时长
	DID	-0.0685*** (0.0184)	-0.0383** (0.0190)	-0.0461** (0.0195)	-0.0729*** (0.0244)	-14.60*** (0.953)
个人	城乡分类	-0.0411** (0.0191)			-0.0159*** (0.0226)	0.105 (0.996)
	年龄	0.00235** (0.00118)			0.00295** (0.00133)	0.107 (0.0686)
	婚姻状态	0.383*** (0.0256)			0.421*** (0.0280)	10.47*** (1.442)
	健康状况	0.0102 (0.00859)			0.00991 (0.00860)	0.564 (0.443)
	受教育程度	0.0282*** (0.00935)			0.0201** (0.00965)	1.657*** (0.502)
	个人生活满意度	-0.0217** (0.00903)			-0.0208** (0.00902)	-0.804* (0.466)
家庭	子女个数		0.122*** (0.0110)		-0.0301* (0.0154)	-0.488 (0.793)
	家庭规模		-0.0181*** (0.00524)		-0.00669 (0.00537)	-0.0771 (0.277)
	干家务时长		0.00237 (0.00566)		0.0151*** (0.00549)	-1.117*** (0.283)
社会	中国就业问题严重程度			-0.0115** (0.00533)	-0.00224 (0.00500)	0.0294 (0.258)
	中国教育问题严重程度			-0.0133** (0.00573)	-0.0131** (0.00531)	-0.113 (0.274)
	中国医疗问题严重程度			0.0159*** (0.00590)	0.00719 (0.00549)	0.0115 (0.283)
	中国住房问题严重程度			-0.0109** (0.00504)	-0.000237 (0.00469)	-0.00897 (0.242)
	Constant	-0.304*** (0.0786)	0.406*** (0.0292)	0.581*** (0.0395)	-0.241*** (0.0906)	-11.36** (4.677)
	样本数	2,582	2,582	2,582	2,582	2,582
	R2	0.152	0.053	0.011	0.158	0.117

*** p<0.01, ** p<0.05, * p<0.1, () 内为标准误差

4.2 异质性分析

4.2.1 城乡差异

表 3 中的数据按照城乡划分，分别以“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女性每周工作时长”为被解释变量，以个人，

家庭，社会方面确定了控制变量，其回归系数的结果均负值，并且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下反映“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劳动参与率成负向影响；其数值分别为-0.0688、-0.0720、-14.58、-14.7，由此的可知，乡村类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分别大于城镇类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表示乡村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受“二孩政策”的负面影响

更加严重。

出现此结果的原因是乡村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受“多子多福”的等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乡村家庭的生育意愿较强。在政策实施后乡村家庭的生育意愿得到

极大满足，生育力得到极大解放，因此受“二孩政策”的影响乡村和城镇的女性劳动参与率都下降，但乡村下降更加严重。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女性劳动参与率		女性每周工作时长	
		城镇	乡村	城镇	乡村
	DID	-0.0688***	-0.0720***	-14.58***	-14.71***
		(0.0250)	(0.0275)	(1.321)	(1.372)
个人	年龄	0.00157	0.00736***	0.0240	0.232**
		(0.00173)	(0.00213)	(0.0917)	(0.106)
	婚姻状态	0.426***	0.425***	12.80***	8.117***
		(0.0383)	(0.0413)	(2.025)	(2.063)
	健康状况	0.0209*	-0.00276	1.052*	-0.193
		(0.0118)	(0.0125)	(0.627)	(0.623)
	受教育程度	0.0271**	0.0218	0.766	2.746***
		(0.0127)	(0.0152)	(0.673)	(0.761)
	个人生活满意度	-0.0179	-0.0279**	-1.419**	-0.0324
		(0.0120)	(0.0137)	(0.636)	(0.684)
	子女个数	-0.0153	-0.0668***	-0.336	-0.666
家庭		(0.0212)	(0.0228)	(1.124)	(1.136)
	家庭规模	0.000663	-0.0119	-0.460	0.365
		(0.00753)	(0.00768)	(0.398)	(0.383)
	干家务时长	-0.0288***	-0.000858	-1.839***	-0.469
		(0.00799)	(0.00750)	(0.423)	(0.374)
	中国就业问题严重程度	-0.00962	0.00887	-0.0765	0.140
社会		(0.00699)	(0.00718)	(0.370)	(0.358)
	中国教育问题严重程度	-0.0145**	-0.0119	-0.279	0.124
		(0.00718)	(0.00787)	(0.380)	(0.393)
	中国医疗问题严重程度	0.00946	0.00374	0.419	-0.497
		(0.00770)	(0.00783)	(0.407)	(0.391)
	中国住房问题严重程度	0.00386	-0.00458	0.0399	-0.0910
		(0.00667)	(0.00657)	(0.353)	(0.328)
	Constant	-0.319**	-0.250*	-8.484	-14.67**
		(0.127)	(0.134)	(6.735)	(6.689)
	样本数	1,441	1,141	1,441	1,141
	R2	0.151	0.191	0.125	0.117

*** p<0.01, ** p<0.05, * p<0.1, () 内为标准误差

4.2.2 已有子女数目差异

表 4 中的数据按照已有孩子个数划分，分别以“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女性每周工作时长”为被解释变量，以个人，家庭，社会方面确定控制变量，其回归系数的结果均负值，并且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下反应“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劳动参与率成负面影响；其数值分别为-0.102，-0.1636，-0.0627，-9.645，-18.99，-17.02。由数据的可知，在以“劳动参与率”和“每周工作时长”

为被解释变量的情况下，家庭中有一个孩子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没有孩子以及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表示有一个孩子的家庭中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受“二孩政策”的负向影响更加严重。

出现此结果的原因是因为已婚已育女性在面对家庭和事业时往往容易产生冲突，并且平衡难度相对较大，所以在“二孩政策”出台后女性选择回归家庭的比例相对增加；还因为女性因生育周期较长，所以在职场受到歧视的情况也较严重。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女性劳动参与率			女性每周工作时长		
		没有孩子	有一个孩子	有两个及以上孩子	没有孩子	有一个孩子	有两个及以上孩子
	DID	-0.102*** (0.0258)	-0.1636*** (0.0349)	-0.0627 (0.0382)	-9.645*** (1.392)	-18.99*** (1.771)	-17.02*** (1.926)
个人	年龄	-0.0437* (0.0245)	-0.00989 (0.0401)	0.00133 (0.00259)	-0.950 (1.322)	4.051** (2.035)	0.0111 (0.130)
	婚姻状态	0.00706** (0.00285)	0.00238 (0.00221)	0.0782 (0.116)	0.392** (0.154)	0.0266 (0.112)	-4.541 (5.831)
	健康状况	0.473*** (0.0354)	-0.172 (0.205)	0.00394 (0.0155)	11.15*** (1.913)	-8.813 (10.38)	1.413* (0.783)
	受教育程度	0.00166 (0.0130)	0.0223 (0.0164)	-0.00781 (0.0221)	0.0235 (0.700)	0.405 (0.834)	-0.134 (1.113)
	个人生活满意度	0.0532*** (0.0134)	0.00770 (0.0178)	-0.0374** (0.0174)	2.580*** (0.725)	0.00840 (0.900)	-1.892** (0.874)
家庭	子女个数	-0.00958 (0.0137)	-0.0181 (0.0162)	0.0136 (0.0400)	-0.819 (0.740)	0.0718 (0.823)	0.299 (2.015)
	家庭规模	-0.00919 (0.00752)	0.0189* (0.0112)	-0.0219** (0.00972)	-0.394 (0.406)	0.246 (0.569)	-0.188 (0.490)
	干家务时长	-0.00832 (0.00850)	-0.0204* (0.0104)	-0.0135 (0.00990)	-0.814* (0.459)	-1.588*** (0.527)	-1.026** (0.499)
社会	中国就业问题严重程度	-0.0184** (0.00754)	-0.00122 (0.00892)	0.0141 (0.00963)	0.0185 (0.407)	-0.00542 (0.452)	0.169 (0.485)
	中国教育问题严重程度	-0.0162** (0.00787)	-0.0173* (0.00990)	-0.0129 (0.00998)	-0.467 (0.425)	0.149 (0.502)	-0.233 (0.503)
	中国医疗问题严重程度	0.0146* (0.00849)	0.0156 (0.00983)	-0.00779 (0.0104)	0.559 (0.458)	-0.00312 (0.499)	-0.160 (0.525)
	中国住房问题严重程度	0.0113 (0.00730)	-0.00451 (0.00820)	-0.00393 (0.00914)	-0.176 (0.394)	-0.0676 (0.416)	0.115 (0.461)
	Constant	-0.437*** (0.128)	0.777* (0.457)	0.656** (0.313)	-18.73*** (6.885)	29.79 (23.19)	25.95* (15.75)
	样本数	1,005	864	713	1,005	864	713
	R2	0.276	0.020	0.034	0.117	0.144	0.120

*** p<0.01, ** p<0.05, * p<0.1, () 内为标准误差

5 结论与建议

“全面二孩”政策放宽了家庭生育子女的限制,使政策覆盖下的一部分女性产生再生育的意愿,生育行为对女性的劳动力供给会产生影响。生育行为会增加家庭的生育成本,然而在家庭分工中生育孩子所增加的时间成本等机会成本主要由女性承担,使女性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增强。此时,当政府、社会和家庭支持的水平较弱时,女性的就业意愿受到削弱,就会选择主动离开工作岗位或暂时中断就业。在宏观上可能表现为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降低,从而降低女性劳动力的供给。

5.1 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6年的微观数据分析国家生育政策调整对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产生冲击。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女性面临低收入、同工不同酬以及调离原岗等问题的比例均有所提升,女性的就业质量相对下降,就业意愿有所降低,并影响未来女性的就业规模,女性的就业结构也会受到影响。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将降低用人单位对女性的劳动力需求。在劳动力需求方面,“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女性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提高了用人单位的经济负担、

人事压力和中小企业的运营压力，使用人单位对女性生育成本的预期提升，而对女性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时间投入的预期下降。由于社会政策尚不完善，女性的部分生育成本转移给用人单位，使用人单位对女性劳动力的偏好降低。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制度性因素，家庭的现代化转变进一步增强了二孩生育对女性就业的不利影响，同时，社会文化传统增强了对女性社会角色的期许。上述因素增强了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冲突，甚至使女性主动离开劳动力市场或中断就业。而社会与政府支持不足，尚未能有效应对女性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面临的就业问题。

5.2 政策建议

建议建立以政府为主、社区为辅、用人单位参与的托幼机构体系和教育托管建设，完善相关的监督机制，降低低龄儿童教育与女性就业之间的矛盾。通过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改革，由相关的社会保障托底，降低生育给用人单位和家庭双方带来的生育成本。在相关的法律规范或行政条例中明确规定对育龄女性的保护原则，同时也明确女性员工孕期报告的责任，充分保护雇佣双方的权利。鼓励女性多种形式就业，鼓励用人单位对育龄期女性执行弹性工作制度等。通过上述政策的实施和不断完善，进一步缓解育龄期女性就业和生育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 [1] 吴蓓. 儿童照料方式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D].南京财经大学, 2020. DOI: 10.27705/d.cnki.gnjcj.2020.000190.
- [2] 富东燕, 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后, 如何促进女性平等就业? [N]. 中国妇女报, 2021.
- [3] 张海峰, 生育政策调整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 [J]. 西北人口, 2022 (3): 14-17.
- [4] 刘爱玉, 2019, 《男人养家观念的变迁: 1990—2010》, 《妇女研究论丛》第3期.
- [5] 陶艳兰, 2015, 《流行育儿杂志中的母职再造》, 《妇女研究论丛》第3期.
- [6] 周庆行, 孙慧君. 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及效应分析 [J]. 经济经纬, 2006 (01): 65-67. DOI: 10.15931/j.cnki.1006-1096.2006.01.019.
- [7] 陈琳, 生育保险、女性就业与儿童发展的研究评述 [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0 (6): 53—58.
- [8] 全国妇联 国家统计局,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 [R], 2011.
- [9] 中国妇女报, 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情况 [R], 2021.
- [10] 郝娟, 邱长溶. 2000 年以来中国城乡生育水平的比较分析 [J]. 南方人口, 2011, 05: 27-33.
- [11] 李卫东, 尚子娟. 男孩偏好作为一种生育文化的生产与在生产 [J]. 妇女研究论丛, 2012, 02: 37-43.
- [12] 侯佳伟, 顾宝昌, 张银锋. 子女偏好与出生性别比的动态关系: 1997-2017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 10: 86-101.
- [13] 张川川. 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和工资的影响 [J]. 人口与经济, 2011 (5): 29-35.
- [14] 南国铉, 李天国. 子女教育对韩国妇女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8700户家庭的调查 [J]. 人口与经济, 2014, (1).
- [15] 康蕊, 吕学静. “全面二孩”政策、生育意愿与女性就业的关系论争综述 [J]. 理论月刊, 2016 (12): 155-161.
- [16] 杨慧, 吕云婷, 任兰兰. 二孩对城镇青年平衡工作家庭的影响——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J]. 人口与经济 2016, (02): 1-9.
- [17] 袁航, 朱承亮. 国家高新区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 [J]. 中国软科学, 2013 (11).